

# 明清政治精英治理：趋势、特征 及决定因素 (1368—1911)

姚沁 陈硕\*

**摘要**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文官制度的国家，其治理经验被众多国家借鉴。但当前针对我国官员治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现当代，对其历史传统的研究依然缺乏系统数据及实证检验。本文试图从两方面弥补这一不足：首先，我们建立明清两代 (1368—1911) 10 465 位省部级以上官员任职信息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治理稳定性指标。我们发现与明代相比，清代官员治理呈现出稳定化趋势。其次，基于 ARDL 模型，本文发现对宦官制度依赖程度是解释两代治理差异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精英选拔，官员治理，明清

**DOI:** 10.13821/j.cnki.ceq.2021.05.13

## 一、前言

官员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面之一，也是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该制度会直接影响官员行为，进而塑造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特征及质量 (Besley, 2005)。近年来，已有大量文献致力于研究不同官员选拔与官员激励机制的差异，并讨论这些差异对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La Porta *et al.*, 1999; Jones and Olken, 2005)。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经济奇迹，众多文献也都认为以经济绩效作为考核重点的官员晋升锦标赛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Xu, 2011; Li and Zhou, 2005)。

不过，目前研究多局限于对当代官员治理体制的考察，较少关注当代制度对官员治理传统的传承性。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全国性官员

\* 姚沁、陈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陈硕，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 600 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0433；电话：(021) 65642334；E-mail: cs@fudan.edu.cn。作者特别感谢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蒋亮教授以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统计与信息学院司继春教授在时间序列分析上给予的帮助，感谢方嫣彤、彭耀辉、王宣艺及杨波等同学优秀的研究助理工作；我们也感谢匿名审稿人、责任编辑及复旦大学“转型与发展”讲座的参与者对本文提出的建议。陈硕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7177302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71933002)、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大项目 (2017-01-07-00-07-E00002)、复旦大学“卓越 2025”人才培养计划以及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理论经济学 1 类高峰计划的资助。文中如有缺失，均为作者责任。

治理体系的国家,该体系不仅为传统中国实现“大一统”提供制度基础,也为当代西方国家文官治理提供了借鉴样板(Toynbee, 1987),其历史意义及经验教训需要被当代中国的官员治理体系所吸收及借鉴。但当前针对我国官员治理传统的研究主要为制度描述或案例分析,鲜有基于系统历史数据的实证研究。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本文建立了明清两代(1368—1911)10 465位省部级以上官员的任职信息数据库。在这些数据库的基础上,我们构建出历年官员治理稳定性指标并发现清代官员治理呈现稳定化趋势。本文试图为上述差异提供实证解释。基于自回归分布滞后(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ARDL)模型,我们发现对宦官制度的依赖程度是两个朝代治理差异的重要相关因素:宦官规模的扩大在长期内和人事变动不稳定性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基于实证证据及一般文献廓清我国官员治理的历史传统具有显著的学术及现实意义。首先,采用系统数据的实证分析可为检验现有理论提供证据,同时,系统数据也可以作为基础启发后续研究;其次,结合一般文献对我国官员治理传统展开研究可以突破断代史研究的不足,能够在统一的框架下对央地关系和官员选拔等重要问题展开长时段分析,其结论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自1840年以来经济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呈现的特征、成因及后果;再次,本文发现凸显出非正式制度对官员治理也有潜在影响作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燕红忠和卫辛(2016)、庄吉发(2016)以及Jia *et al.* (2015)等学者分别就传统中国及当代语境对该问题的探讨;最后,由此获得的发现及结论有助于我们吸收之前的经验教训,为当下大国治理提供借鉴。

本文组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介绍数据来源、电子化过程及结构;第四部分介绍治理稳定性指标的构建方法,并且根据这些指标廓清明清时期官员治理的趋势及特征;第五部分探讨其决定性因素;第六部分为结论。

## 二、官员治理相关文献

### (一) 官员治理一般理论

基于理性人假设,经济学文献认为个体在制度中的行为是可以预测的。在该框架中,个体异质性并不重要(Buchana, 1989)。但不可忽视的是,现实中同一制度下不同官员表现可能大相径庭。这使得研究者意识到对政策选择及经济政策评估分析离不开具体实施的官员。由此经济学文献开始将注意力投向此前被忽略的官员治理问题上,具体包括选拔(Besley and Coate, 2003)、晋升(Li and Zhou, 2005)、调动(Iyer and Mani, 2012; Khan *et al.*,

2018)、撤职 (Ferraz and Finan, 2011) 及影响 (Evans, 1995)。这些研究大都侧重于检验制度化因素对官员流动的影响, 针对非制度化因素的研究文献较为有限。

## (二) 传统中国官员治理文献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我国当代官员治理体制的考察, 而较少关注到历史中官员治理传统的传承性。众所周知,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全国性官员治理体系的国家, 为近代西方国家的文官治理提供了借鉴样板 (Toynbee, 1987)。目前针对我国传统官员治理的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第一, 一般性制度安排, 比如吕思勉 (1944)、钱穆 (1952)、白钢 (2002)、楼劲和刘光华 (2009) 与严耕望 (2013) 等; 第二, 特定体系运作, 比如等级制度 (阎步克, 2010)、科举制度 (商衍鎏, 1958)、八旗官制 (杜家骥, 2008)、地方官制 (瞿同祖, 1962; 刘伟, 2003) 与捐纳制度 (许大龄, 1947; 伍跃, 2013) 等。就本文所关注的非正式制度来说, 目前针对其与正式制度间关系的讨论包括捐纳制度对于官员晋升的影响 (燕红忠和卫辛, 2016)、奏折系统对君臣关系的影响 (庄吉发, 2016)。由于缺乏系统性历史数据, 上述传统文献大多采用制度描述或案例分析的方法。

最近已有学者开始建立关于传统官员治理的数据库并尝试结合计量方法针对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比如李中清及康文林“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 (任玉雪等, 2016)<sup>1</sup>、科举选拔的兴起 (代谦和别朝霞, 2015)、选拔标准 (Jiang and Kung, 2021)、影响 (Bai and Jia, 2016; Chen *et al.*, 2020)、其他选拔方式 (燕红忠和卫辛, 2016) 以及官员问责机制 (Xi, 2019)。和传统研究方法相比, 采用系统数据并结合计量方法探讨前现代我国官员治理的经济学研究依然有限。

## 三、数 据

### (一) 样本范围

我们试图建立明清两代 (1368—1911) 从三品以上文官职位设置及任职官员数据库。数据来源于张德信 (2009) 和钱实甫 (1980)。这两部著作以时间为线索分别记录了明代和清代中央及省级政府职位中任职官员的姓名。我们再根据吕宗力 (2015) 为每个职位都匹配了对应官品 (图 1)。

<sup>1</sup> 我们综述了目前被学界广泛使用的明清政治精英数据库,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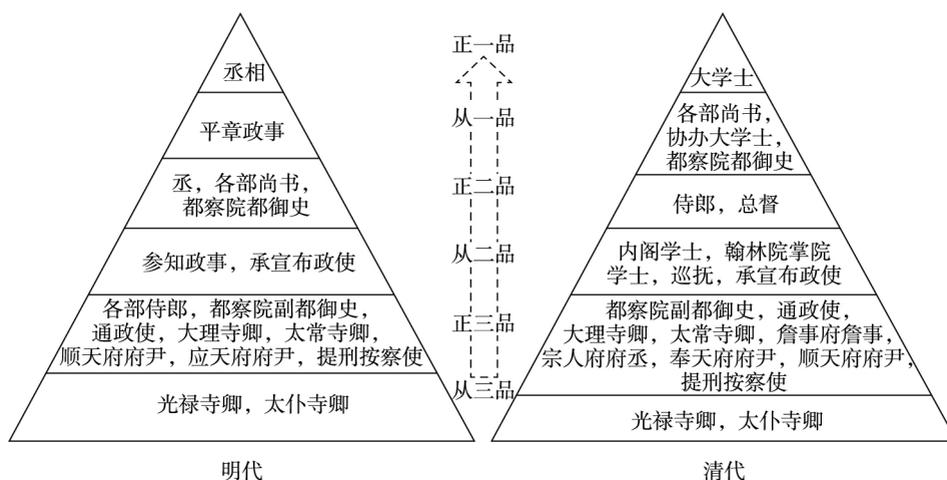


图1 样本范围

注：根据吕宗力（2015）绘制。

中央职位官员样本包括明代前期的丞相、清代内阁大学士以及明清两代的中央六部、都察院与其他事务性职能机构的最高官员。其中，六部每部最高官员分为正副两级，正级官员称为尚书，副级称为侍郎；都察院官员与六部一样，也分为正副两级，正级官员称为都御史，副级称为副都御史；事务性职能机构的最高官员只有一级，通政使司官员为通政使，各寺长官为卿。

地方职位样本主要有三个部分：省级最高官员、都城与陪都的府级官员以及陪都各部院最高官员。其中，由于明代总督与巡抚没有品级，因此明代省级最高官员包括承宣布政使司的最高官员承宣布政使与提刑按察使司的最高长官提刑按察使，不包括总督与巡抚样本。清代样本则包括了上述所有官员。样本中地方职位的第二部分为都城与陪都的所在府的最高官府尹，明代为顺天府府尹和应天府府尹，清代为顺天府府尹和奉天府府尹。最后，明清两代设置于陪都的部院最高官员也包含在样本中。

本文最终建立起来的数据库涵盖明清 38 种职位历年任职官员信息 88 421 条，包含官员人数共 10 465 个。其中，明代 17 个职位 4 937 个官员，清代 21 个职位 5 528 个官员。为进一步判断样本代表性，我们根据吕宗力（2015）中的《历代职官品位表》，计算了样本中的职位种类占当时所有从三品以上文职种类的比例。总体而言，该比例约为 75%，其中明代约为 71%，清代约为 78%。不在样本中的职位共有 12 种（明代 6 种，清代 6 种），基本为非行政性职位（如孔子嫡长子孙的世袭封号）和少量专职性职位（如主管运输事务的都转运使以及内务府名下主管养马事务的苑马寺卿等）。这些证据说明了本研究的样本覆盖了明清所有重要职位。

## （二）电子化过程

图 2 展示了张德信（2009）中一页职官录的界面。这一页记录的是 1558 年 13 个省份“承宣布政使”的任职官员姓名。在该页中，空格意味着当年该职位的任职官员空缺；如果一格出现一个以上姓名的话，意味着该职位在这年出现人事变更。最终建立起来的数据库涵盖明清 287 个职位历年任职官员信息 88 421 条，包含官员人数共 10 465 个。<sup>2</sup>

明代職官年表

年代 官職	嘉靖卅七年 戊午（1558）		
	左	右	
山 東	游居敬 八、丙寅、廿二， 副都撫雲南。	翁大立 是年、廣東右布 使遷。	
山 西	劉望之 三、辛亥、 三、飭聽勘 回籍。	朱用 四、癸巳、 十六、右布 使遷。	張永明 是年、陝西 右布使遷。 朱用 四、癸巳、十六、遷左。
河 南	範欽 九、戊子、十五、遷右 副都撫南贛。	呂時中	林懋和 閏七、甲申、九、遷廣 東左布使。 竇一桂 閏七、丁酉、廿二、 山東按使遷。
陝 西	郭乾		張永明 是年、遷山西左布使。
四 川	羅崇奎		周復俊
江 西	宋淳 六、戊子、十二、遷右 副都撫南贛、未赴、 令聽勘。	張元冲	陳錠 十一、癸未、十、遷右 副都撫應天。 郝良臣 十一、乙酉、十二、山 東按使遷。
湖 廣	傅鎮		谷嶠 四、癸巳、十六、湖廣按使遷。
浙 江	陳仕賢		寇陽
福 建			王國楨 是年、廣東參政遷。
廣 東	魏良貴 閏七月、遷南右副都 提操江。	林懋和 閏七、甲申、九、河南 右布使遷。	翁大立 是年、遷山東左布使。
廣 西	熊洛 四、辛卯、十四、遷應 天尹。	林應亮 四、癸巳、十六、右布 使遷。	林應亮 四、癸巳、十六、遷左。
雲 南	鮑道明 九、丙申、廿三、遷應 天尹。	張堯年 是年、右布使遷。	張堯年 是年、遷左。 敖宗慶
貴 州	楊守約 九、乙未、廿二、罷。		

图 2 职官录年表

注：该图来自张德信（2009）第四册第 3436 页。

<sup>2</sup> 整个样本重名者 549 人（占总数 5.25%），我们对其进行区别处理。重名者的发现是通过随机抽样与人工核查相结合的方式，限于篇幅我们没有报告操作的细节，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要。

## 四、明清官员治理稳定性

### (一) 指标建构

政治体系的稳定运转可以为官员提供稳定预期 (Spiller and Tommasi, 2007)。本文衡量明清两代官员治理稳定性的指标是用条件方差所表示的官员治理情况偏离预测趋势的大小。<sup>3</sup>在操作过程中, 该指标基于人事流动速度  $Turnover_t$  计算获得。<sup>4</sup> $Turnover_t$  表示某职位在  $t$  年人事变化的次数: 取值越高说明当年人事变化越频繁, 意味着官员流动越快。

在  $Turnover_t$  的基础上, 我们构建出官员治理稳定性指标  $Volatility_t$ 。在实际操作中, 该指标一般基于 Bollerslev (1986) 提出的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 (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cedasticity, GARCH) 模型计算获得。采用最常用的 GARCH (1, 1) 过程, 设置如下:

$$Turnover_t = \alpha_0 + \alpha_1 Turnover_{t-1} + \varepsilon_t, \quad (1)$$

$$\sigma_t^2 = \gamma_0 + \gamma_1 \varepsilon_{t-1}^2 + \gamma_2 \sigma_{t-1}^2. \quad (2)$$

从方程 (1) 可知,  $Turnover_t$  由  $Turnover_{t-1}$  延续下来的可预期部分与当期冲击  $\varepsilon_t$  带来的不可预期部分组成。方程 (2) 中的  $\sigma_t^2$  为方程 (1) 中当期冲击  $\varepsilon_t$  基于前一期情况的条件方差。对方程 (1) 与 (2) 进行联合估计获得的  $\sigma_t^2$  拟合值即是冲击的条件方差  $Volatility_t$ 。与直接计算人事流动速度相比, 该指标由于排除了由过往情况延续的可预期部分, 因此能够更加准确地衡量出官员治理的稳定性程度。

### (二) 官员治理: 趋势及特征

图 3 展示了明清两朝官员治理稳定性指标的变动趋势 (a) 和人事流动速度 (b)。首先, 就人事流动速度来说, 可以发现清代官员流动速度显著慢于明代。平均而言, 明代每个职位上人事流动速度约为每年 0.57 次 (每隔 1.75 年发生一次人事变化), 清代的数值为每年 0.49 次 (每隔 2.04 年发生一次人事变化)。其次, 从波动指标看, 明代稳定性指标的数值为 0.048 次<sup>2</sup>, 而清代仅为 0.034 次<sup>2</sup>。此外, 就不稳定时期的长短来说, 明代数值超过全样本均值 0.041 次<sup>2</sup> 的有 113 年, 这意味着明代近一半时间都处于不稳定状态。与之对比, 清代超过 0.041 次<sup>2</sup> 的时期仅为 51 年, 仅占该朝代约 1/5 时间。

<sup>3</sup> 该方法也被广泛用来衡量政策的不确定性 (相关研究见 Servern, 1998; Henisz, 2004)。

<sup>4</sup> 人事流动速度指标只反映特定职位在一定时间内的人事变化频次, 不涉及职位的升降。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明清两朝官员品级不可比的问题。就这两个朝代的官员升降来说, 晋升占 44.7%, 平调占 34.5%, 降职占 8.0%, 没经历变化的占 3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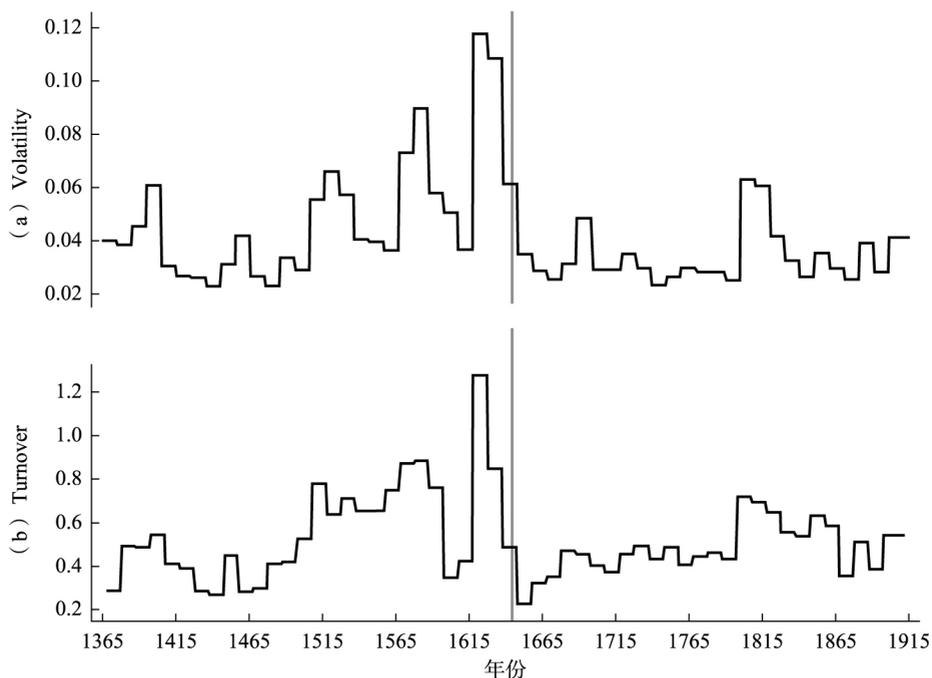


图3 明清两代官员流动变化趋势

注：图（a）纵轴为官员流动冲击的条件方差，单位为次<sup>2</sup>；图（b）纵轴为官员流动速度，单位为次。灰色直线为明清朝代分界。

## 五、明清官员流动差异的影响因素：实证讨论

### （一）宦官制度与官员流动

两个朝代在治理稳定性指标上所呈现出的系统性差异促使我们探索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本部分试图做一些初步的尝试。我们认为塑造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宦官制度。作为皇帝的私人奴仆，宦官没有后代的属性使该群体对皇权威胁程度较低进而时常被统治者引入治理与决策过程中，以达到和官员体系抗衡的目的（杜婉言，2017，第3—4页；余华青，2006，第47页）。这种利用宦官治理的情况也广泛存在于波斯、埃及、古希腊及罗马帝国（Egorov and Sonin, 2011；Finer, 1997）。虽然历朝历代对于宦官内部管理与其服侍职役方面逐渐设定了较为完善的制度<sup>5</sup>，但是利用宦官治理体现了更多的人格化特征：其权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个人因素。在皇帝年幼或疏于

<sup>5</sup> 明代宦官机构是由十二监、四司与八局组成的“二十四衙门”，各衙门内的宦官级别又由低至高分为一般宦官、长随、监丞、少监与太监（余华青，2006，第414页；吕宗力，2015）。清代则设立宦官总管理机构内务府。宦官级别由低到高分为一一般宦官、笔贴式、首领太监、副总管太监与总管太监（黄本骥，2005；余华青，2006；吕宗力，2015）。就宦官的升迁而言，据齐畅（2014）统计，明代从一般宦官升至最高级宦官太监一般需要20年至30年时间。

朝政时,宦官就会攫取到很大的权力(余华青,2006;杜婉言,2017)。<sup>6</sup>

图4展示了明清两代的宦官规模。首先,明代宦官规模远大于清代:明代宦官人数平均约为8531人,而清代平均约为3034人,仅为明代的1/3;其次,就变动情况来看,明代宦官人数波动较大,而清代则总体上呈现较为平稳的递减趋势。明太祖在建国初期严格将宦官限制在100人以内,但从明太祖后期以后宦官规模就开始逐渐增加:洪武十五年(1382)增加宦官360人(余华青,2006,第389页)。该数字到明中期之后迅速膨胀:万历(1573—1620)与天启(1621—1627)年间多次增设宦官(胡丹,2014)。清代则明确限定了宦官数量不能超过3300人(余华青,2006,第491页)。<sup>7</sup>由于该数据在很多年份中存在缺失,我们采用线性插值的方法进行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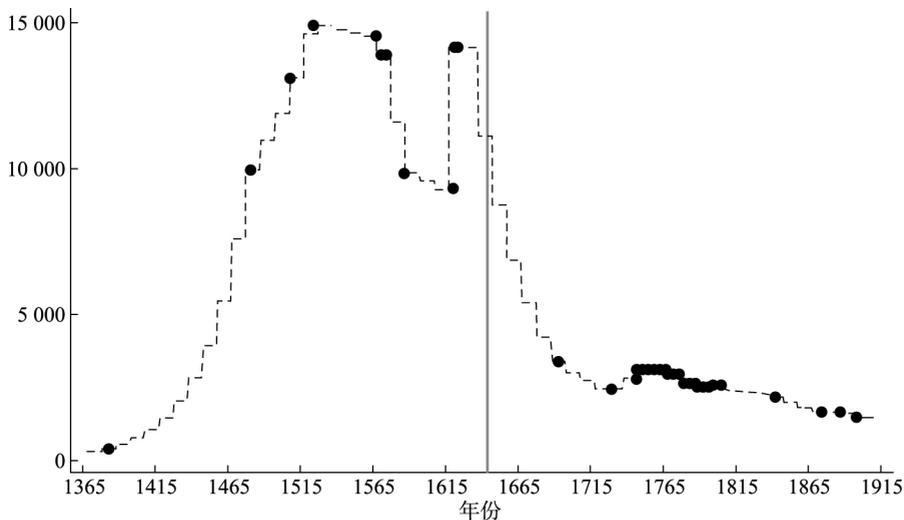


图4 明清宦官规模

注:纵轴为十年内平均宦官人数。其中,实心原点代表明确记载的宦官人数,虚线部分为根据两个实心圆点之间平均增长率计算出来的人数。

<sup>6</sup> 由于宦官是许多皇帝幼年时期的玩伴,因此宦官较容易在皇帝即位初期攫取到较大权力。明代2位10岁以下皇帝在(即)任后均经历宦官揽权情况。明英宗8岁即位后,宦官王振凭借信任成为明代第一位专政宦官;明神宗9岁即位后,宦官冯保挑拨内阁首辅高拱与皇帝关系,在高拱被罢官后逐渐被神宗重用。这种情况在清朝并未出现(余华青,2006)。此外,宦官权力扩张的另外一个时机是皇帝疏于朝政时。这在明清两朝均有出现,但整体来说清代皇帝勤政程度远高于明朝(王志明,2016)。

<sup>7</sup> 我们认为明清宦官人数的差异能够体现出其背后的权力大小。学者认为与明代相比,清代则将宦官的势力范围控制在一定界限内,进而有效地抑制了宦官势力的形成。比如,清代政府不仅从法规上对宦官参与政事严加防范与惩罚,而且还不断强化宦官作为家奴的卑贱地位,使其权力与地位都受到限制(余华青,2006;杜婉言,2017)。清代宦官在19世纪后期趋于活跃,但宦官数量指标并没有刻画该趋势。我们在实证分析部分试图从三个方面加以处理:第一,基于两个朝代的子样本做单独回归;第二,用不包含1850年之后的样本重新估计;第三,尝试在明代子样本中使用那些有碑传宦官的数量来捕捉其活跃程度。胡丹(2014)中罗列了目前发现的所有183位明代宦官碑传。这些碑传多为当时文人为有地位的宦官所撰,可在一定程度上刻画其活跃程度。采用上述方法进行的估计结果依然显示宦官规模与治理不稳定性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在正文中展示这些回归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图 3 中清代官员治理的稳定化趋势与图 4 中清代宦官人数的下降趋势让我们推测官员治理稳定性也许和宦官规模存在相关关系。在下一小节中我们将实证考察宦官制度对明清治理后果的影响。表 1 展示了实证研究涉及变量的统计描述。

表 1 统计描述

变量名	数据来源	数据类型	均值 (标准差)
解释变量	宦官规模	明代宦官数据来自 Tsai (1991)、丁易 (1983)、胡丹 (2014, 2018); 清代宦官数据来自王树卿 (1984)、滕德永 (2015) 与 Kutcher (2018)。这些学者的原始数据来自《明实录》和清代《内务府奏案》。	连续变量 5 852.37 (4 934.60)
被解释变量	人事流动冲击 条件方差	张德信 (2009) 与钱实甫 (1980)	连续变量 0.041 (0.027)
控制变量	气温	董安祥 (1993)	虚拟变量 —
	洪涝灾害	宋震海 (1992)	虚拟变量 —
	干旱灾害	宋震海 (1992)	虚拟变量 —
	蝗虫灾害	陈高儒 (2007)	虚拟变量 —

注：(1) 所有变量以年为记，数量均为 544 个。(2) 连续变量中，宦官规模单位为人，人事流动冲击的条件方差单位为次<sup>2</sup>。(3) 虚拟变量中，气温共有 3 个取值，每个取值分别为与 1980 年相比的温度差；洪涝、干旱与蝗虫灾害为 2 值哑变量，发生取 1，否则为 0。

## (二) 模型设置

官员治理稳定性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当下水平可能受到前期水平的影响，与此同时，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宦官规模也可能具有持续性。我们需要将这种动态关系纳入模型中。为此，本文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设定如下：

$$Volatility_t = \beta_0 + \sum_{i=1}^p \beta_{1,i} Volatility_{t-i} + \sum_{i=0}^q \beta_{2,i} Eunuch_{t-i} + X_t' \gamma + \epsilon_t, \tag{3}$$

其中， $t$  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  $Volatility$  表示官员人事变化稳定性，核心解释变量为宦官规模  $Eunuch$ ，单位是千人， $p$  与  $q$  分别表示  $Volatility$  和  $Eunuch$  的滞后阶数。此外，我们在模型中也逐步控制了可能会影响官员治理情况的气温、洪水与干旱以及蝗虫灾害的发生次数，这些变量在方程中以向量  $X$  来表示。

由于存在较多滞后阶数，研究者很难整体评价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

是否有影响。Hassler and Wolters (2005) 采用误差修正模型 (Error Correction Model, ECM) 来克服该问题。方程 (4) 和 (5) 为方程 (3) 经过误差修正转换之后的形式:

$$\Delta Volatility_t = \sum_{i=1}^{p-1} \theta_{1,i} \Delta Volatility_{t-i} + \sum_{i=1}^{q-1} \theta_{2,i} \Delta Eunuch_{t-i} \quad (4)$$

$$+ \delta \times ECT_{t-1} + X' \gamma_2 + \varepsilon_t,$$

$$ECT_{t-1} = Volatility_{t-1} - c - \alpha_2 Eunuch_{t-1}, \quad (5)$$

其中, 方程 (4) 中的  $\Delta Volatility$  和  $\Delta Eunuch$  分别表示变量  $Volatility$  和

$Eunuch$  的一阶差分。 $\theta_{1,i}$  和  $\theta_{2,i}$  为短期系数, 满足  $\theta_{1,i} = \sum_{j=i+1}^p \beta_{a,j}$ ; 当  $i=0$

时满足  $\theta_{2,i} = \beta_{2,0}$ , 当  $i \geq 1$  时,  $\theta_{2,i} = \sum_{j=i+1}^q \beta_{2,i}$  (Hassler and Wolters, 2005)。

系数  $\theta_{2,i}$  衡量的是宦官规模的短期影响。 $ECT_{t-1}$  是滞后一期的误差修正项

(Error Correction Term)。其中,  $c = -\beta_0/\delta$ ,  $\alpha_2 = \sum_{j=0}^q \beta_{2,j} L^j / (1 - \sum_{j=0}^q \beta_{2,j} L^j)$ 。

$L$  是滞后因子, 满足性质  $L^k x_t = x_{t-k}$ 。 $\delta$  为动态调整系数,  $\delta = \sum_{i=1}^p \beta_{1,i} - 1$ 。以上

模型中我们假设核心解释变量跟被解释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Volatility = c + \alpha_2 Eunuch$ 。公式中的误差修正项捕捉了系统  $(Volatility_t, Eunuch_t)$  偏离长期均衡的程度。因此, 方程 (4) 是朝向长期均衡关系的动态调整的结构化表达方式, 误差修正项  $ECT_{t-1}$  表示被解释变量在  $(t-1)$  期偏离长期均衡的程度 (Alogoskoufis and Smith, 1991)。因此, 动态调整系数  $\delta$  表示朝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率, 我们预期其应显著为负并且取值位于  $0-1$  之间。方程 (5) 中的系数  $\alpha_2$  是宦官规模的长期影响, 反映了一单位解释变量的变化对被解释变量带来的永久性影响 (Hamilton, 1994)。

对误差修正模型进行有效估计的前提是通过边界检验 (Bounds Test), 本文采用 Pesaran *et al.* (2001) 提出的方法。根据变量的单整阶数, 该检验适用于三种情况: 变量均为  $I(0)$ 、均为  $I(1)$  和既有  $I(0)$  也有  $I(1)$ 。<sup>8</sup> 对于第一或第二种情况, 通过该检验说明变量间存在均衡/协整关系。在第三种情况下即使通过检验, 变量间关系也不能表述成均衡/协整关系, 而应表述为有条件的长期关系 (Conditional Long-run Relationship) (Pesaran *et al.*, 2001)。

<sup>8</sup> Pesaran *et al.* (2001) 分别给出了前两种情况时的临界值。当  $F$  值大于临界值时可以拒绝  $x$  和  $y$  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原假设。当属于第三种情况时, 结论取决于  $F$  的位置: 当  $F$  值大于第二种情况的临界值时, 拒绝原假设; 当  $F$  值小于第一种情况的临界值时, 无法拒绝原假设; 当  $F$  值位于两种情况之间时, 边界检验无法给出结果。

### （三）单位根检验

我们依次采用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ADF), Phillips-Perron Test (PP) 以及 Elliot-Rothenberg-Stock Dickey-Fuller GSL Detrended Test (DF-GLS) 三种方法来确定单整阶数。表 2 汇报了单位根检验结果，从中可以发现被解释变量稳定性指标为零阶单整 ( $I(0)$ )，解释变量宦官规模为一阶单整 ( $I(1)$ )。控制变量温度、洪灾与旱灾均为一阶单整 ( $I(1)$ )，蝗灾为零阶单整 ( $I(0)$ )。上面检验结果意味着涉及变量属于第三种情况。

表 2 单位根检验

变量	ADF	PP	DF-GLS	单整阶数
稳定性指标	-7.08***	-7.06***	-8.26***	$I(0)$
	[0]		[10]	
宦官规模	-2.37	-2.10	-1.04	$I(1)$
	[12]		[12]	
	-3.59***	-5.29***	-3.08**	
	[11]		[13]	
温度	-2.35	-2.35	-0.97	$I(1)$
	[0]		[1]	
	-23.26***	-23.26***	-16.18***	
洪灾	[0]		[18]	$I(1)$
	-4.54***	-18.27***	-2.20	
	-10.64***	-52.36***	-2.61*	
旱灾	[13]		[18]	$I(1)$
	-1.19	-16.03***	-1.35	
	[15]		[15]	
蝗灾	-10.13***	-68.36***	-25.79***	$I(1)$
	[14]		[1]	
	-10.04***	-18.76***	-4.18***	
	[2]		[18]	$I(0)$

注：\*\*\*、\*\*、\*分别表示 1%、5%、10% 显著性水平。ADF 与 DF-GLS 检验中系数下面一行对应滞后阶数，滞后阶数根据 AIC 准则选择。

### （四）边界检验

表 3 汇报了边界检验结果。根据 Pesaran *et al.* (2001) 和 Narayan (2007)，

我们同时汇报了三种设定下的结果：带不受限制的常数项但不带趋势项、带不受限制的常数项且带受限制的 trend 项以及带不受限制的常数项且带不受限制的 trend 项。这三种设定下  $F$  统计量均显著。此外，Pesaran *et al.* (2001) 指出需要进一步结合动态调整系数的  $t$  检验来排除一些退化可能性 (Degenerate Cases)。我们在表 3 中汇报了这些  $t$  统计量并发现在所有模型设置中均显著，这意味着退化可能性非常小。综合单位根、 $F$  及  $t$  检验结果，实证分析涉及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间存在有条件的长期关系。

表 3 边界检验

	无时间趋势	含有有限制时间趋势	含有无限制时间趋势
无朝代固定效应			
$F$	26.483***	25.066***	37.586***
$t$	-7.231***	-8.584***	-8.584***
$\chi^2_{SC}(1)$	0.912	1.054	1.054
$\chi^2_{SC}(4)$	5.600	3.110	3.110
滞后阶数	[2, 4]	[2, 4]	[2, 4]
含朝代固定效应			
$F$	28.124***	25.105***	37.657***
$t$	-7.326***	-8.545***	-8.545***
$\chi^2_{SC}(1)$	1.164	0.985	0.985
$\chi^2_{SC}(4)$	6.727	3.002	3.002
最优滞后期	[2, 4]	[1, 4]	[1, 4]

注：\*\*\*、\*\*、\*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滞后阶数为根据 AIC 准则选择，[2, 4] 表示被解释变量滞后 2 阶，解释变量宦官规模滞后 4 阶。

### (五) 回归结果

表 3 的发现支持了宦官规模和官员治理稳定性间存在有条件的长期关系，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对式 (4) 展开最小二乘 (OLS) 估计。表 4 汇报了基础回归的结果。我们在第 (2) 列控制了可能会影响官员治理情况的天气情况，包括温度和自然灾害<sup>9</sup>；在第 (2) 列回归的基础上，我们在第 (3) 及第 (4) 列中先后加入了无限制的时间趋势项与皇帝固定效应。在回归中，滞后阶数根据 AIC 准则选取。

首先，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与预期一致，显著为负且在 -1 与 0 之间；其次，在所有的回归模型中都能发现宦官规模的扩大和官员治理不稳定性存在

<sup>9</sup> 我们也尝试基于地区灾害信息计算全国所有地区受灾比重，采用该变量没有改变估计结果。

长期关系。以第（4）列估计系数为例，宦官规模每增加1 000人，官员稳定性指标增加0.007次<sup>2</sup>。该关系在控制了温度与自然灾害情况〔第（2）列〕、考虑时间趋势〔第（3）列〕及皇帝固定效应〔第（4）列〕后依然存在。<sup>10</sup>

表4 宦官与官员治理稳定性

	(1)	(2)	(3)	(4)
宦官规模	0.003*** (0.001)	0.004*** (0.001)	0.005*** (0.001)	0.007*** (0.002)
温度	有	有	有	有
自然灾害	无	有	有	有
时间趋势	无	无	有	有
皇帝固定效应	无	无	无	有
调整 R <sup>2</sup>	0.148	0.156	0.164	0.206
AIC	-3 048.074	-3 051.401	-3 056.214	-3 063.870
误差修正项	-0.195***	-0.205***	-0.233***	-0.340***
滞后阶数	[2, 4]	[2, 4]	[2, 4]	[1, 2]
观测值数量	540	540	540	540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为了展示方便我们没有汇报短期系数，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表4的结果可能受到插值与取样方法的影响。就插值方法来说，我们尝试使用另外两种插值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只在朝代内部数据进行插值。具体来说，我们使用明代可得晚期数据进行插值向后外推获得明代末期的数据，用清代中期的可得数据插值向前外推获得清代早期的数据。其次，只在数据可得性较好的时期（1480—1625年和1725—1900年）进行插值，并基于此子样本进行回归。这两种插值方法对应的估计结果分别见表5第（1）和（2）列。<sup>11</sup>就取样方法来说，一方面，有研究指出清代的满族官员和汉族官

<sup>10</sup> 明清发生的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比如靖难之役，王振、刘瑾和魏忠贤乱政，夺门之变，大礼议事件，以及明清后期内乱等也会显著影响治理稳定性，我们分别通过引入皇帝固定效应、控制战争频率（战争数据来自《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以及删除明清更替1620—1683年间观察值来捕捉或排除这些因素的影响。此外，我们也控制了皇帝勤政程度与官员党争程度这些影响官员治理稳定性的政治因素。其中，勤政程度用皇帝每年引见官员数量测量，该数据来自《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秦经国，1997），只在清代可得；官员党争程度通过《明实录》与《清实录》中“结党”出现的频次来测量。上述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这些变量和重新取样后宦官规模估计结果依然稳健。皇帝在就职初期和末期都有可能进行较大规模人事调整，为了控制该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我们也引入了皇帝交接年份固定效应，同样发现宦官规模估计结果依然稳健。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在正文中展示这些回归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sup>11</sup> 此外，黄仁宇（2001）也对明代部分时期的宦官规模进行了估计。由于是估计值，我们没有作为实证分析的原始数据使用。但我们也尝试利用这些估计值重新差值估算了明代数据，发现估计结果与表4第（5）列差别不大。这点感谢审稿人建议。

员的治理方法存在差异,而原始样本并没有加以区分。<sup>12</sup>如果清代官员治理稳定性来自对满人职位的一些特殊照顾,这会导致对宦官制度作用的高估。另一方面,原始样本为从三品以上官员。由于同样拥有实权的明代总督(共计452人)和巡抚(共计1809人)没有品级因此没有进入样本,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明清样本的不可比。我们用以下两个方法对上述问题加以处理:首先,我们通过引入朝代固定效应来刻画制度差异[表5第(3)列];其次,我们通过更严格的方法确保明清样本的可比性:在清代样本删掉满人职位,使研究都集中在两个朝代的汉人职位上[表5第(4)列];在明代数据中增加总督与巡抚样本[表5第(5)列]或在清代样本中剔除总督与巡抚样本[表5第(6)列],使得样本中的职位相似。<sup>13</sup>我们发现不管通过何种方法,表5中宦官规模和官员治理稳定性间的相关关系一直存在,这意味着本文发现没有受到明清两个朝代特定官员制度设置或取样方法所驱动。<sup>14</sup>

表5 宦官与官员治理稳定性:稳健性检验

	朝代内插值	子样本插值	增加朝代 固定效应	删掉清代 总督巡抚	增加明代 总督巡抚	删掉清代 满人职位
	(1)	(2)	(3)	(4)	(5)	(6)
宦官规模	0.003*** (0.001)	0.006*** (0.002)	0.004*** (0.001)	0.004*** (0.01)	0.002*** (0.001)	0.005*** (0.001)
温度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自然灾害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时间趋势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up>12</sup> 清代在许多中央重要职位比如内阁大学士以及各部、院、寺的正副长官等会同时设置满汉两个职位。满职位由满人担任,汉职位由汉人担任。同一职位上满汉职位的职权与品级相等,实行满汉双轨制(杜家骥,2014)。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满官员在选拔及调动上依然享有许多特权:在选拔上,与汉官员主要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不同,满官员除了科举考试外还能通过世袭、八旗官学和翻译科举等多样化方式入仕。同时,满官员在科举考试中的录取名额也远高于汉官员;在调动上,与汉官员相比,满官员升迁速度较快且普遍存在破格升迁的情况(杜家骥,2008)。但从数据上我们并没有发现两个轨中稳定性指标的均值存在差异:满职位和汉职位的稳定性指标均值都是0.069。此点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sup>13</sup> 针对取样问题,我们也进行了一系列其他稳健性检验。首先,有学者认为明代在成化(1465—1487)时期后督抚设置相对固定化(王天有,1991),我们也只使用1487年之后的样本重新估计表4第(5)列;其次,我们也尝试在样本中加入较为重要但是没有官品以及较为重要非文职的职位:明代没有官品的内阁大臣(171人)、清代没有官品的军机大臣(148人)以及清代较为重要的非文职内务府总管大臣(190人);再次,我们也将地方官员与中央官员分为两个样本单独回归;最后,考虑到陪都的政治功能与首都差异较大,我们也删除了陪都的样本进行检验。基于上述取样方法的回归结果都表明表4的估计是稳健的。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在正文中展示这些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sup>14</sup> 此外,我们也尝试不采用任何插值方法的OLS估计。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即表4第(3)列]后,宦官规模OLS估计系数是0.001,依然在5%水平上显著。

(续表)

	朝代内插值 (1)	子样本插值 (2)	增加朝代 固定效应 (3)	删掉清代 总督巡抚 (4)	增加明代 总督巡抚 (5)	删掉清代 满人职位 (6)
朝代固定效应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调整 $R^2$	0.138	0.206	0.163	0.163	0.155	0.138
AIC	-3 040.463	-1 738.128	-3 054.483	-3 044.679	-3 423.992	-3 413.198
误差修正项	-0.217***	0.300***	-0.236***	-0.253***	-0.305***	-0.132***
最优滞后期	[1, 4]	[1, 3]	[1, 4]	[1, 4]	[1, 1]	[2, 4]
观测值数量	540	314	540	540	540	540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为了展示方便我们没有汇报短期系数，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 六、讨论与结论

本文建立了明清两代1368—1911年10 465位省部级以上官员的任职信息数据库。在这些数据库的基础上，我们构建出官员治理稳定性指标，发现清代官员治理稳定化趋势。本文试图为该差异提供实证解释。基于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我们发现对宦官制度依赖的程度是解释两个朝代治理差异的重要相关因素。

我们尝试讨论宦官制度发挥影响的理论基础。宦官在大部分时期无法担任正式官员体系中的职位，因此宦官参与政务及攫取权力主要通过两个渠道：第一，宦官凭借与皇帝较为亲近的优势和官员相互结交进而参与政务；第二，宦官也可以通过影响皇帝观点与行为参与到政务中。可以发现宦官发挥作用体现出非常明显的人格化特点，这与正式制度中所强调的非人格化特征恰好相反（North, 1990, 1991；Helmke and Levitsky, 2004）。学者也注意到这种人格化的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存在潜在负面影响（Helmke and Levitsky, 2004）。比如，当两种制度所产生的权力所有者并非同一人时，非正式制度就会削弱正式制度运转的稳定性（Helmke and Levitsky, 2004；Levitsky and Murillo, 2009）。具体到宦官群体，上述两个渠道都会对官员治理尤其是官员稳定性产生潜在影响。在前种情况下，宦官的参与会加剧官员体系内部帮派的形成与斗争，进而造成官员体系的失衡与波动；在后一种情况下，获取皇帝信任的宦官得以直接向皇帝提议非常规性的官员调动，更有甚者则通过将

皇帝与官员相隔离而独自操作。上述两种方式均存在于在明清两代政治中。<sup>15</sup>这也被本文实证分析中发现的宦官制度与官员稳定性之间的负向关系所支持。

和明代相比,清代宦官的权力被极大限制且没有承担显著的政治功能。清代更能体现官员治理中非政治制度特征的是康熙时期开始实施的奏折制度。与传统政务文书不同,奏折在其传递过程中具有较强的保密性,因而逐渐成为清代皇帝广泛使用的私密信息获取渠道(庄吉发,2016)。<sup>16</sup>但相比来说,明代上报政务的文书不具备清代所赋予的达到皇帝和近臣的私人化通讯功能。<sup>17</sup>本文的目的或潜在贡献在于结合长期系统性历史数据,廓清了明清时期官员流动与治理的基本趋势与特征。这让我们第一次能够在统一的框架下结合文献对官员治理等问题展开长时段的初步探索分析。系统性数据也为我们接下来进一步探索传统中国官员治理的背后驱动因素与影响提供了基础;其次,由此获得的发现及结论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吸收之前的经验教训,为当下大国治理提供借鉴,另一方面也为不同时期及不同国家的官员治理差异提供解释性证据。

## 参考文献

- [1] Alogoskoufis, G. S., and R. Smith, "The Phillips Curve, the Persistence of Inflation, and the Lucas Critique: Evidence from Exchange-rate Regim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1, 81 (5), 1254-1275.
- [2]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 [3] Bai, Y., and R. Jia, "Elite Recruitment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The Impact of the Abolition of China's Civil Service Exam", *Econometrica*, 2016, 84 (2), 677-733.
- [4] Besley, T., "Political Sele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5, 19 (3), 43-60.
- [5] Besley, T., and S. Coate, "Elected versus Appointed Regulators: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sup>15</sup> 例如,明英宗(1436—1449年与1457—1464年)时期,宦官王振与官员结党营私:对谄媚自己的官员大力提拔,对反对自己的官员则撤职迫害;明神宗(1573—1620)时期,宦官冯保与大学士张居正对抗内阁首辅高拱,在官员体系内部造成人事波动;明熹宗(1621—1627)时期,宦官魏忠贤更是利用熹宗对政务的反感与疏忽而独揽大权,制造了“乙丑诏狱”与“丙寅诏狱”,排挤和整肃了大量官及尚书、左都御史等异己官员;清德宗(1875—1908)时期,宦官李莲英与小德张凭借着慈禧太后的宠爱卖官鬻爵(余华青,2006)。上述事件所造成的稳定性波动也体现在我们的数据之中:首先,  $Volatility_t$  在这些时期的均值为 0.052 次<sup>2</sup>,而其他年份仅为 0.039 次<sup>2</sup>;其次,  $Volatility_t$  的最高值 0.222 次<sup>2</sup> 正出现于这些年份中。

<sup>16</sup> 在奏折制度以前,官员上呈的政务文书通常需要经由中间机构审核后上报至皇帝。为了便于掌握更多信息,康熙年间开始在传统政务文书制度以外建立奏折系统。上呈奏折无需通过中间机构的审核,通常由官员派遣其亲信直接送至宫中待皇帝批阅后再交其带回。这种传递方式加强了信息的保密性,成为清代皇帝与下属间的私密沟通渠道(庄吉发,2016)。

<sup>17</sup> 我们也统计了每年奏折数量并只基于清代数据检验了奏折系统对官员稳定性的影响,其中奏折数据来源于《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宫中档康熙朝奏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光绪朝朱批奏折》与《宫中档光绪朝奏折》。我们发现奏折制度和宦官规模对官员治理稳定性作用均为负,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这两种制度都提取了非正式制度的特征。

-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3, 1 (5), 1176-1206.
- [6] Bollerslev, T., "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cedasticity",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86, 31, 307-327.
- [7] Buchanan, J. M., "The Public Choice Perspective", in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 [8] 陈高儒,《中国历代天灾人祸》。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 [9] Chen, T., J. K. S. Kung, and C. Ma, "Long Live Keju!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China's Civil Examination System", *Economic Journal*, 2020, 130 (631), 2030-2064.
- [10] 代谦、别朝霞,“土地改革、阶层流动性与官僚制度转型:来自唐代中国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15年第15卷第1期,第53—84页。
- [11]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年。
- [12] 董安祥,“甘肃省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高原气象》,1993年第12卷第3期,第243—250页。
- [13] 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 [14] 杜家骥,《杜家骥讲清代制度》。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
- [15] 杜婉言,《侥幸:中国宦官与中国政治》。北京:东方出版社,2017年。
- [16] Egorov, G., and K. Sonin, "Dictators and Their Viziers: Endogenizing the Loyalty-Competence Trade-off",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11, 9 (5), 903-930.
- [17] Evans, P.,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8] Ferraz, C., and F. Finan,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and Corruption: Evidence from the Audits of Local Governmen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01 (4), 1274-1311.
- [19] Finer, S. E., *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Vols I-II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0] “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7年影印本。
- [21] “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宫中档康熙朝奏折》。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2年影印本。
- [22] “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2年影印本。
- [23] “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5年影印本。
- [24] Hamilton, J. D., *Time Series Analys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25] Hassler, U., and J. Wolters, "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Models and Cointegration", *Allgemeines Statistisches Archiv*, 2005, 90 (1), 59-74.
- [26] Helmke, G., and S. Levitsky,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A Research Agenda",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04, 2 (4), 725-740.
- [27] Henisz, W. J.,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Policy Volatility", *Economics & Politics*, 2004, 16 (1), 1-27.
- [28] 胡丹,《明代宦官史料长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
- [29] 胡丹,《明代宦官制度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
- [30] 黄本骥,《历代职官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31]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 [32] Iyer, L., and A. Mani, "Traveling Agents: Political Change and Bureaucratic Turnover in India",

-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2, 94 (3), 723-739.
- [33] Jia, R., M. Kudamatsu, and D. Seim, "Complementary Roles of Connections and Performance in Political Selec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15, 13 (4), 631-668.
- [34] Jiang, Q., and J. K. S. Kung, "Social Mobil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Reconsidering the 'Ladder of Success' Hypothesis", *Modern China*, 2021, 47 (5), 628-661.
- [35] Jones, B. F., and B. A. Olken, "Do Leaders Matter? National Leadership and Growth since World War II",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 120 (3), 835-864.
- [36] Khan, A. Q., A. I. Khwaja, and B. A. Olken, "Making Moves Matter: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Incentivizing Bureaucrats through Performance-based Posting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8, 109 (1), 237-270.
- [37] Kutcher, N. A., *Eunuch and Emperor in the Great Age of Qing Rul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8.
- [38] La Porta, R., F. Lopezdesilanes, A. Shleifer, and R. Vishny,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999, 15 (1), 222-279.
- [39] Levitsky, S., and M. V. Murillo, "Variation in Institutional Strength",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9, 12 (12), 115-133.
- [40] Li, H., and L. A. Zhou,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89 (9), 1743-1762.
- [41] 刘伟,《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42] 楼劲、刘光华,《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修订版)》。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 [43] 吕思勉,《中国政治史》。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1944年)。
- [44] 吕宗力,《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 [45] Narayan, P. K., "The Saving and Investment Nexus for China: Evidence from Cointegration Tests", *Applied Economics*, 2007, 37 (17), 1979-1990.
- [46] 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47] North, D. C.,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1, 5 (1), 97-112.
- [48] Pesaran, M. H., Y. Shin, and R. J. Smith, "Bounds Testing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Leve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001, 16 (3), 289-326.
- [49] 齐畅,《宫内、朝廷与边疆:社会史视野下的明代宦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 [50]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952年)。
- [51] 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 [52] 秦经国,《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 [53]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修订译本》。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1962年)。
- [54] 任玉雪、陈必佳、郝小雯、康文林、李中清,“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与官员群体研究”,《清史研究》,2016年第4期,第61—77页。
- [55] Severn, L., "Macroeconomic Uncertainty and Private Investment in LDC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Mimeo, The World Bank, 1998.
- [56] 商衍灏,《清代科举考试述略》。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年(1958年)。
- [57] 宋震海,《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
- [58] Spiller, P., and M. Tommasi,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Public Policy: A Transactions Theory and an Application to Argent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59] 滕德永,“清宫太监逃亡问题探析”,《故宫学刊》,2015年第1期,第96—105页。

- [60] Toynbee, A. J., and D. C. Somervell, *A Study of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61] Tsai, S. S. H.,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Ming Eunuchs",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1991, 25 (2), 121-146.
- [62] 王树卿, "清朝太监制度",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84年第2期, 第3—20页。
- [63] 王天有, 《晚明东林党议》。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
- [64] 王志明, 《清代职官人事研究》。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 [65] 伍跃, 《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年。
- [66] Xi, T., "All the Emperor's Men? Conflicts and Power-sharing in Imperial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19, 52 (8), 1099-1130.
- [67] Xu, C.,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1, 49 (4), 1076-1151.
- [68] 许大龄, 《清代捐纳制度》。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50年(1947年)。
- [69] 阎步克, 《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
- [70] 严耕望, 《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
- [71] 燕红忠、卫辛, "科举教育、捐官制度与官员晋升——基于清代官员履历档案的实证研究", 《财经研究》, 2016年第11期, 第4—18页。
- [72] 余华青, 《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
- [73] 张德信, 《明代职官年表》。合肥: 黄山书社, 2009年。
- [7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5年影印本。
- [7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苏州: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年影印本。
- [7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影印本。
- [7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光绪朝朱批奏折》。北京: 中华书局, 1996年影印本。
- [78]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中国历代战争年表》。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 2003年。
- [79] 庄吉发, 《清朝奏折制度》。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6年。
- [80] 《明实录》。北京: 中华书局, 2016年影印本。
- [81] 《清实录》。北京: 中华书局, 2008年影印本。

## Bureaucratic Stabilit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rend, Pattern and Determinant (1368—1911)

QIN YAO SHUO CHEN\*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in traditional China has far-reaching influence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systematic dataset containing 10 465 officials at

---

\* Corresponding Author: Shuo Chen,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600 Guoquan Rd., Shanghai, 200433, China; Tel: 86-21-65642334; E-mail: cs@fudan.edu.cn.

provincial or ministerial level or abov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1368-1911) and provid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The instability index of bureaucratic turnover shows that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in Qing Dynasty is much more stable than that in Ming Dynasty. Moreover, the instability index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number of eunuchs, indicating that the reliance of eunuch system is an important factor underlying the difference of bureaucratic stability between the two dynasties.

**Keywords** political selection, bureaucratic system, ming and qing

**JEL Classification** H11, N45, H79